

马尔德诺夫论孔孟的儒家乌托邦思想

靳铭吉 姜 铎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作为20世纪知名的俄罗斯汉学家, 马尔德诺夫通过深入研读中文文献, 探究了中国古代孔孟的儒家乌托邦思想。这不仅肯定了中国存在乌托邦思想的观点, 而且回应了中国乌托邦思想不成熟的观点, 同时也为中国学者研究儒家思想提供了他者视角。

关键词: 马尔德诺夫; 孔孟; 儒家乌托邦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07.8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乌托邦这个概念最早由托马斯·莫尔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1516)中提出。莫尔的乌托邦具有两层含义: 子虚乌有的地方和美好的地方。莫尔期望废除私有制, 建立人人平均的集体主义观念, 达到整个社会的幸福及财富平均分配、集体和谐与平衡。那么在遥远的中国古代是否也存在着这样的“乌托邦思想”呢? 张隆溪在《乌托邦: 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2008)一文中肯定了中国也存在着乌托邦思想, 并且与西方乌托邦思想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世俗化是西方乌托邦思想产生的前提, 而古代儒学对现世和人伦有更多的关怀, 更加注重人间的世俗和人现世的作用, 希望上古理想社会的繁荣成为衡量现在社会的尺度, 并且鼓励个人通过努力使现在乃至未来达到完美。唐文明在《乌托邦主义与古今儒学——评张灏的中国思想史研究》(2019)一文中也承认中国古代存在乌托邦思想, 并对“中国乌托邦”做出“以完美主义的理想来憧憬和期待未来社会”的定义。他总结了孔子的乌托邦思想, 即孔子认为只有修身而达到道德完美, 理想世界才会来临, 而且只有彰显神圣本质的人才能统治天下, 只有这样的圣王才能为社会带来理想秩序。此外, 学者国风在《追求完美的梦——儒家政治思想的乌托邦性格》(2007)中指出“乌托邦思想是指一种与思想所产生的环境实况不相符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目的是彻底改变与此思想不符的现实环境, 但是这种思想在原则上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国风认为乌托邦思想在中国古代的表现模式为: “理想”的实现或寄托于远古的“黄金时代”, 或是渺不可知但又必然来临的未来时刻, 又或是远离人类聚居社会的新天地。在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 乌托邦思想并没有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流, 然而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流却都含有乌托邦思想的性质。

面对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 俄罗斯的汉学家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研究最深入的莫过于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马尔德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 1933.10.2—2013.12.15)。马尔德诺夫是俄罗斯杰出的汉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 也是远东传统思想研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社会乌托邦》(1987)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乌托邦的看法, 而且肯定了儒家乌托邦主义倾向的积极作用。在该书中乌托邦

被视为与现有完美世界不同的任意映像，其所创造的世界是与现实世界对立的，即带有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态度。马尔德诺夫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乌托邦思想的流变，并且揭示了乌托邦思想在后期儒释道三教主流思想发展中的特殊性，驳斥了中国社会乌托邦思想不成熟的论点，彰显了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

2 马尔德诺夫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乌托邦思想的形成

马尔德诺夫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就存在着乌托邦思想，而且这一时期是乌托邦思想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在这之后数千年，中国的乌托邦思想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发展的。

（Мартынов 1987：13）此时政治上虽然分裂，文化却高度发达且统一，百家争鸣产生的学术思想层出不穷，而古代的乌托邦思想就体现在百家争鸣的各种哲学流派中。不过，不同哲学流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消化吸收了所有中国文化共有的上古“黄金时代”的特征后，都试图将某个想象的上古社会作为理想社会，于是提出了各自的理想社会的方案，并试图通过它们的学说来恢复这一理想的古代社会。如道家认为理想的时代是黄帝时期，农家认为是神农时期，儒家和墨家则认为是尧舜时期，后又将伏羲时期补充进来。此外，马尔德诺夫在分析了对上古“黄金时代”的各种描述后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意识层面已经形成了有关乌托邦思想4方面的问题，即肥沃的土地及产出的丰硕果实、长生不死、合理的劳动方式、人类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形式，如道家总是把自己绑在生死问题上，探索各种长生不老的手段，而相比之下，儒家则强烈倾向于人类社会组织的形式。

关于儒家的乌托邦思想，马尔德诺夫认为，其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古代、汉代和中世纪，划分理由是：这三个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对应着一种儒家乌托邦类型，而这三种乌托邦类型又对应着儒家的三个身份：哲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创造者。需要指出的是，马尔德诺夫这里所说的古代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么，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乌托邦类型对应着哲学家这一身份呢？

在马尔德诺夫看来，在春秋战国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下，有些诸侯国国君对传统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失去了信心，他们急切地寻求任何可以巩固其财富并使他们成为整个周朝继任者的方法。正是这种对公共行政领域各种有效创新措施强烈而紧迫的需求，才使得周游列国的孔子——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儒家乌托邦思想的开创者有了存在的价值。这反映在定公问孔子的子的问题中。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事实上，齐宣王在问孟子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可见，尽管当时的诸侯国国君对强军和强国更感兴趣，但他们同时普遍相信，可以借助某种抽象的理论方法快速改变世界，或者至少是自己所在的诸侯国。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儒家的乌托邦思想得以形成。儒者向当权者保证，如果听从他们的建议，国家就会繁荣。所以，马尔德诺夫认为，这个阶段儒家的乌托邦应该被归类为理想统治的乌托邦，同时也是哲学家倡导的乌托邦。他同时指出，如果采用 Л. Мэмфорд 对乌托邦的分类，即“逃亡的乌托邦”和“重建的乌托邦”，那么中国古代的儒家乌托邦无疑应该属于“重建”的乌托邦，即重建上古的理想社会，恢复上古的社会繁荣，带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不过，马尔德诺夫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我们就此断言是上述的社会需要赋予儒家乌托邦思想以具体的政治样貌，那么我们会大大歪曲了儒家思想的历史。相反，儒家的这种乌托邦思想不是立即形成的，更不是专门针对这一主题提出的，而是作为整个儒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断探究社会行为、治理国家的手段以及保证国家繁荣的最佳典范，甚至还包括改善人类生存的共同条件等方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Мартынов 1987：14—15）

3 马尔德诺夫论孔孟的儒家乌托邦思想

前面已经提到，儒家乌托邦思想与其同时代其他流派的乌托邦思想一样，都将某个想象的古代时期作为理想社会，并建议同时代人对其进行“重建”。在马尔德诺夫看来，儒家针对“重建”理想社会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即理想社会由什么样的人来引领？重建的重点是

什么？于是“完美圣人”这一名词呼之欲出，并贯穿儒家乌托邦思想始终。

3.1 理想社会中的完美圣人

所谓“完美圣人”，即能够领导理想社会的君子。对此马尔德诺夫指出，儒家传统上认为现世的“完美圣人”手中握有最高权力才是社会生活的理想特征。（Мартынов 1987: 17）因为在儒家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历史经验、自然条件没有起到重要作用。诚然，我们可以通过编年史尝试发现“完美圣人”出现的规律，但仅此而已。因此，理想生活的“恢复”必须从“人”的因素开始，即要找到圣人。马尔德诺夫认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乌托邦的目标不同于具体的政治任务，它需要在经验现实中寻找不存在的理想人格模型。他进而补充道，“必须要指出的是，在这方面儒家不是开先河者，对圣人的向往在道家、墨家和法家那里都存在。所以，可以姑且认为，在所有这些流派的乌托邦思想中，占据主要位置的是‘个人乌托邦主义’，即为谋求社会福利所需的更高智慧的个体与最高权力的有机结合。流派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对“完美圣人”的具体理解。”（Мартынов 1987: 17）

对于儒家创始人孔子而言，“理想社会”中“完美圣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在马尔德诺夫看来，孔子认为圣人是一个超验的，即乌托邦式的人物，在他所处时代的现实中是没有的，正如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所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孔子说：“圣人我是不可能看到了，能看到君子，这就可以了。”）不过，马尔德诺夫认为在《论语·公冶长》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第五》）孔子坐着，颜渊、季路两人站在孔子身边。孔子道：“何不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道：“愿意把我的车马衣服同朋友共同使用坏了也没有什么不满。”颜渊道：“愿意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向孔子道：“希望听到您的志向。”孔子道：“[我的志向是，]老者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年轻人使他怀念我。”（杨伯峻 2009: 58）

马尔德诺夫认为，这段话有着复杂且周密的逻辑结构，从内容上来看，该文段中包含了道德自我完善之路上的三个晋升阶段。子路、颜回和孔子三个人都开启了道德自我完善之路，因为他们战胜了庸俗的利己主义，而这一点是儒家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思辨建设中非常重视的一点。子路处于第一阶段，他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即可以舍弃眼前的物质利益，在物质财富的世界中坚持与他人共享，并坦然接受由此带来的不便。颜渊处于第二阶段，他努力使自己在道德自我提升不引起他人的不适，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处在最后一个阶段。他已经超越了前两个阶段，不再关注与个人行为相关的事情，而是把全部精力投放到社会领域，在这里人类集体对他而言就是有着不同利益需求的不同年龄段的人。孔子并不希求他们生活在神话般的幸福中，而是希望每个人能够有最基本的保障，以使他们处于“最佳状态”中，即老人得到安宁，年幼者得到照顾，中年人，也是社会最活跃的部分，生活在相互信任的状态中。

不仅如此，马尔德诺夫还进一步分析道，“可以将其解释为是对儒家所希望恢复的三种理想的古代社会类型的描写，每种类型都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Мартынов 1987: 19）子路为人正派，其高尚的德行是儒家提出的方案取得成功的充分保证；颜渊是君子，政权可以放心地转移到他的手中。而孔子本人就是“完美的圣人”。理想社会中国家的最高权力就应该赋予上述三种类型的人。相应地，只有当社会是由这类人组成且每个人都在为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道德统一做出贡献时，理想的社会状态才会出现。这一预设可以被视为儒家倡导的乌托邦社会的基础，且该预设贯穿整个儒学史，出现在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有关改善人类社会生活条件的讨论中。马尔德诺夫将以上论述概括为，“如果最高国家权力属于‘完美圣人’，

而帮助他的又是有智慧有德行的人，那么社会将变得像上古理想社会那般幸福安康。”我们注意到，在接下来《论语·述而》中讲到学生倾向于将孔子视为完美圣人：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述而第七》）/孔子说道：“讲到圣和仁，我怎么敢当？不过是学习和工作总不厌倦，教导别人总不疲劳，就是如此如此罢了。”公西华道：“这正是我们学不到的。”（杨伯峻 2009：87）

对此孔子表示“自己不敢当”。我们知道，孔子带着一众弟子周游列国 14 年，期盼能有国君接受他为政的思想，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上古理想社会。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成为那个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完美圣人”，在颜回等贤德弟子的辅助下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总是寄希望于各诸侯国的国君。所以马尔德诺夫指出，上面的预设是一种中立的表达，如果放在治理框架下它将转变成“要成功地将理论转变为生活实际，国君必须是‘有大智慧之人’，他的臣子也必须有智慧。”由此，马尔德诺夫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帝王思想简单且彻底地解决了实现理想社会的问题：从中国秦朝开始，每一个在位的君王都被赋予完美圣人的名号，因此“呈上”成为皇帝的代名词。于是，统治阶级用儒家思想中的“完美的圣人”的乌托邦思想倾向来维护自己的王朝统治。对此，马尔德诺夫评价道：“在同时代，儒学无力与这种恶意利用自己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进行斗争，只能安于从历时的角度，在历史文献中进行回击，毫不留情地揭发不久之前那些所谓的‘完美圣人’是多么没有道德、刚愎自用或者被愚弄的微不足道之人，认为他们没有智慧去弥补自身的不足以吸引当之无愧之人任职。”（Мартынов 1987：19—20）在马尔德诺夫看来，也许这就是儒家思想与帝王意识最激烈的交火点之一。而另一方面，马尔德诺夫指出，如果说儒家乌托邦思想的要点在这一思想承载者的个人命运上，那么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每一个师承孔子教诲的儒者（智者）应该遇到一个完美圣人，当然，这个圣人要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晓得自己招募儒者的重要意义并愿意将儒者的建议转化为现实。于是，儒家学者人生之路上最重要的一段就是“期待”——期待与“完美圣人”会面。也正是在这种“期待”中书写出儒家的乌托邦方案。关于这一点邓牧、黄宗羲等儒家乌托邦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也认为有必要予以强调。

3.2 理想社会的重建重点

马尔德诺夫认为，孔子在《论语》中对实现理想社会涉及的第二个问题——重建的重点，给出了解答。

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我听说过：无论是诸侯或者大夫，不必着急财富不多，只需着急财富不均；不必着急人民太少，只需着急境内不安。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杨伯峻 2009：195）

这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之间关于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对话。孔子认为，财富均衡才可以使百姓安定，没有贫穷。百姓和睦团结，国家内部就不会有倾覆。这一论述中体现了儒家社会政治方面两个最重要的立场：只有处于和谐状态的社会才是强大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马尔德诺夫认为，这段话也可以解读为，为了理想古代和谐社会的成功“重建”，有必要实现物质利益的平均分配。他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方面，孟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思想中首次融入了具体的政治措施，因此马尔德诺夫称孟子是儒家学派最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

孟子同样生活在政治分裂、诸侯割据的社会环境之中，诸侯希望在自己所辖区内实现繁荣，同时渴望成为天朝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孟子认为，天朝的人民是流动着的，并且没有限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用脚投票”，选择君主。那么，百姓会选择怎样的君主呢？孟子指出，实施仁政可以留住自己的人民，并且吸引其他流动的人民。任何君主一

旦在“仁政”上真正达到了完美，那么普天之下的百姓恨不得立刻投奔他——“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六节》）/“如果有一位不好杀人的君王，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伸长着脖子期待他的解放了。真是这样，百姓的归附于他，跟随着他，好像水的向下奔流一样，那又有谁能够阻挡得住呢？”（杨伯峻 2008：10）孟子称这样的国君是“无敌之君”，其力量在于“得民心”。

这是一种纯粹的思辨结构，哲学家与国君就国家管理的必要方法进行思想交流。在这一交流中孟子有关“仁政”的更微观、更具体的思想，即乌托邦主义框架得以发展。孟子认为，国君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对人民的剥削。他梦想有一个爱护农民、珍惜他们的时间、体力和土地财富、不会剥夺人民劳动成果政府。马尔德诺夫将如下两段视为孟子乌托邦思想的集中体现。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三节》）/在五亩大的宅园中，种植桑树，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丝绵袄了。鸡狗与猪等等家畜家家都有饲料和工夫去饲养，那么，七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有肉吃了。一家人百亩的耕地，不要去妨碍他们的生产，那么，几口人的家庭可以吃得饱饱的了。好好地办些学校，反覆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大道理训导他们，那么，〔人人都会敬老尊贤，为老人服务，〕须发花白的人也就不会头顶着、背负着重物件在路上行走了。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绵衣穿，有肉吃，一般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杨伯峻 2008：5）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三节》）/如果在农民耕种收获的季节，不去〔征兵征工，〕妨碍生产，那粮食便会吃不尽了。如果细密的鱼网不到大的池沼里去捕鱼，那鱼类也会吃不完了。如果砍伐树木有一定的时间，木材也会用不尽了。粮食和鱼类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便使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百姓对于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就是王道的开端。（杨伯峻 2008：5）

马尔德诺夫指出，第一段看上去似乎与乌托邦观点并无联系，其中描绘的社会安康景象很难让人与“黄金时代”联系起来。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景象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从未在任何地方实现过。此外，其中不难看出儒家乌托邦思想的必备要素，即有为社会各年龄段人民生活创造“正常”条件的目标，这一般体现为，当涉及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时，儒家会坚定地反对基于任何其他原则的社会区分。

第二段看起来非常现代，它似乎是在一个已经完全了解生态刚性规律的社会中写出来的。然而，孟子最想表达的与其说是遵守严苛的自然生态规律，不如说是希望当权者对农业的需求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他想保护农民免受政府的专断，并为此孜孜不倦地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根据“井田”的原则划定土地的方法。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节》）/孟子说：“你的君准备实行仁政，选择你来问我，你一定要好好干！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田界划分得不正确，井田的大小就不均匀，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合理，所以暴虐的君王以及贪官污吏一定要打乱正确的田间界限。田间界限正确了，分配人民以田地，制定官吏的俸禄，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决定了。”

（杨伯峻 2008：91）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节》）/“滕国的土地狭小，却也得有官吏和劳动人民。没有官吏，便没有人管理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也没有人养活官吏。我建议：郊野用九分抽一的助法，城市用十分抽一的贡法。公卿以下的官吏一定有供祭祀的圭田，每家五十亩；如果他家还有剩余的劳动力，便每一劳动力再给二十五亩。无论埋葬或者搬家，都不离开本乡本土。共一井田的各家，平日出入，互相友爱；防御盗贼，互相帮助；一有疾病，互相照顾，那么百姓之间便亲爱和睦了。办法是：每一方里的土地为一个井田，每一井田有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有田，以外八百亩分给八家作私有田。这八家共同来耕种公有田。先把公有田耕种完毕，再来料理私人的事务，这就是区别官吏与劳动人民的办法。这不过是一个大概，至于怎样去修饰调度，那就在于你的君和你本人了。”（杨伯峻 2008：91）

马尔德诺夫认为，毫无疑问，“井田制”是孟子及整个中国古代时期最著名的乌托邦思想。在之后中国的历朝历代，它一直是被热议的主题。对此，马尔德诺夫解释道：“‘井田’之所以被后世瞩目主要是因为它是儒家乌托邦两个主要思想——‘仁政’和物质财富平衡——最直观且切实可行的方案。从上文给出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孟子把这种制度看作是‘仁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这种土地使用方式不仅能平均分配税收负担，而且能进而平均分配物质利益，维护社会稳定。”（Мартынов 1987：24）马尔德诺夫进一步强调，“在孟子看来，严格按照社会地位明确分配物资，是实现和谐社会最有效的手段。但‘井田’并不是他实现‘仁政’的唯一手段，如孟子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方案，即从天子到农民，每个人都被分配严格固定的土地，并以此确定其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当然，这是早在周朝就存在的真实社会秩序，孟子认为应该‘重建’。”（Мартынов 1987：24）

总而言之，在马尔德诺夫看来，与“仁政”这一宏伟项目中包含的所有其他措施一样，“井田”制度追求的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目标，即实现“国家革新”和确定一个当之无愧的竞选者来管理国家。而孟子的这一乌托邦思想始于他对当代历史环境完全不切实际的解释。在孟子看来，任何君主一旦做到了“仁政”，那么其他国家的百姓都会转来投靠他。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他希望减少税收负担，让财产平均分配，他努力地推进自己的“物质财富均等化”和“社会和谐化”的社会繁荣计划，但最终未能得偿所愿。

综上所述，马尔德诺夫洞悉了儒家孔孟乌托邦主义中的核心思想，即在中国古代，儒家学派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积极地促进着理想社会的发展，把乌托邦代表的“更好的现实”转变为一个真正存在的古代理想社会、一个理想政府。马尔德诺夫指出，儒家的孔孟两位夫子认为只有将国家权力转移到“完美圣人”的手中，才能改变客观现实，达到理想社会的繁荣。而“重建”会促进物质财富均等化和社会和谐化，达到“同乐”。

4 对马尔德诺夫儒家乌托邦思想的评析

首先，马尔德诺夫对中国古代乌托邦思想的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进步意义。相较于其他学者对中国古代乌托邦思想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孔子、孟子等儒学奠基人身上，较少触及后世思想转变这一情况，马尔德诺夫的研究横贯了整个中国儒家发展二千多年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元朝，从《论语》《礼记》《汉书》到《陶渊明集》《原道》《君道》《吏道》，从孔子到韩愈、邓牧等儒学大家¹，将儒家乌托邦思想在中国古代发展的脉络清晰地展现给读者，并有力地提炼出不同时期、不同儒家代表思想中的乌托邦要素，绘制出一幅儒学乌托

邦思想发展的流变图，为肯定中国存在乌托邦思想又增添了强有力的论证。马尔德诺夫视野之宽阔，思路之清晰，是许多国外汉学家乃至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具体而言，马尔德诺夫对于中国乌托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重视乌托邦理想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即乌托邦不可能实现，但乌托邦绝对不是神化的情结，而是在现实中可能寻见踪迹的。因此古代学者把乌托邦思想寄托在了时间维度——“黄金时代”上，例如儒家向往上古三代，道家归于黄帝时期，农家向往神农时代……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乌托邦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差之千里；二是研究乌托邦思想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例如古代的春秋时期，乌托邦的创造者是以孔子为首的儒者，而承载者便是创造者所期待与之相遇的“完美圣人”。儒家乌托邦思想十分关注其承载者的个人命运，创造者期待与这位完美圣人的相遇，承载者会理解这位创造者加入的必要性。为了实现社会繁荣，这位承载者必须是一位智者，并能够吸引其他德高望重的人前来帮助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在位的君主都会被提升为完美的圣人，并称其为“圣上”的原因之一。

其次，对于中国是否存在乌托邦思想这个问题，A.C. 马尔德诺夫与俄罗斯另外一位学者 Д.Е. 马尔德诺夫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后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乌托邦思想，只有近代一些对西方社会思想最新成果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才促使乌托邦主义在中国出现，承载者仅是与康有为改革运动有关联的少数精英人员。而 A.C. 马尔德诺夫却认为，乌托邦思想是一个古老的思想，甚至比文明都古老，是每个民族都具备的思想。从儒家恢复三代辉煌、道家恢复黄帝时代的期待，到文人对完美圣人的期待，再到后来失去信心的学者们纷纷归隐山林的无奈，这都是乌托邦思想在中国社会意识中的体现。A.C. 马尔德诺夫由此对乌托邦思想加以界定，认为乌托邦思想的主题为“更好的现实”，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的社会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正如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言：“一幅不包括乌托邦的世界地图不值一瞥，因为它漏掉了一个人类永在那里上岸的国家。人类在那里登陆后，向外望去，看见了一个更好的国家，又扬帆起航。进步就是实现乌托邦。”（杨东霞，杨烈等译 2000：302）

最后，马尔德诺夫结合孔孟等儒学经典中的表述，详尽地论述了孔子和孟子儒家乌托邦思想的具体体现，并将其总结为哲学家的乌托邦主义，其实现途径为道德上的“完美圣人”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并参照“黄金时代”对社会财富平均分配而完成理想社会的“重建”。马尔德诺夫对孔孟儒家乌托邦思想的认知再次说明了中国社会乌托邦思想的存在及其特点。

5 结束语

马尔德诺夫认为虽然在中国并没有像托马斯·莫尔和坎帕佩拉这样的学者，但是孔子、孟子等思想家则完全可以与他们并列。马尔德诺夫揭示了在儒释道传统主流思想中发展的中国社会乌托邦特殊性，驳斥了中国社会乌托邦不成熟的论点，认为在乌托邦思想上中国不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和西方国家同样的成就。儒家思想一直以来都在中国文化发展上有一个基本导向作用，而乌托邦则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尔德诺夫对中国儒家乌托邦思想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学者研究乌托邦思想提供新的视角和论证方法，为此我们将在今后继续探究其对春秋之后直至五四之前对中国乌托邦思想的认知与观点。

附注

- 1 篇幅所限，本文未对马尔德诺夫春秋战国之后的儒家乌托邦思想展开详尽论述。

参考文献

- [1] Мартынов А.С. Конфуцианская утопия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7.

- [2][英]奥斯卡·王尔德. 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M].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 [3] 国 风. 追求完美的梦——儒家政治思想的乌托邦性格[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4).
- [4] 唐文明. 乌托邦主义与古今儒学——评张灏的中国思想史研究[J]. 读书, 2019(8).
- [5]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6]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7] 张隆溪. 乌托邦: 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J]. 山东社会科学, 2008(9).

Martynov's Opinions about the Confucian Utopianism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Jin Ming-ji, Jiang Duo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a famous Russian sinologist in the 20th century, Martynov explored the Confucian Utopianism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in ancient China through in-depth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not only affirms the view that there is Utopianism in China, but also responds to the view that China's Utopianism is not mature. It also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study Confucianism.

Keywords: Martynov; Confucius and Mencius; Confucian Utopianism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1 年度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扶持项目“‘翻译+汉学’模式下中国儒学典籍俄译研究——以俄罗斯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的《论语》俄译本为例”(项目号: WY2021074-C)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靳铭吉(1974—), 黑龙江哈尔滨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俄罗斯汉学, 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姜铎(1998—), 黑龙江哈尔滨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俄罗斯汉学。

收稿日期: 2022-11-23

[责任编辑: 信 娜]